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學

季評

QUARTERLY

BOOK REVIEW

二〇〇四年六月第二期
JUNE 2004 NUMBER 2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書評〉

- 劉澤華 《中國的王權主義》 張師偉 1
- 林佳龍編 《未來中國》 沈有忠 4
- Joseph S. Nye, Jr. & John D. Donahue, ed.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楊昊 7
- Ralph D. Ellis *Just Results: Ethical Foundations for Policy Analysis* 劉昭博 10
- 龍應台 《面對大海的時候》 馮先祥 13
-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戴天楷 16
-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 趙文志 19

〈書目〉

- 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w ed.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游雅斐 22
- Ira Katznelson & Martin Shefter ed. *Shaped by War and Trad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efan Heumann 24

政治科系季評

二〇〇四年六月
第二期



- 資深編輯顧問 高朗、石之瑜
編輯顧問 王順文、莊國銘、廖高賢
主編 楊立彥
編輯委員 林皇曦、陳俊華、陳蔚芳
曾隆盛、劉建宏、戴天楷
校外編輯委員 林御翔
發行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 2391-8756

劉澤華

中國的王權主義

張師偉 / 西北政法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系講師

許多中國歷史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週期性特徵。蔣廷黻先生在《中國近代史綱》中提到了中國歷史的迴圈套問題，王守稼先生的《封建末世的積澱和萌芽》更詳細地討論了中國歷史的週期性。中國歷史為什麼不能突破固有的週期而邁步進入近代化社會？有人將中國長期遲滯在傳統社會的原因歸結為中國經濟結構的先天不足，也有人把原因歸結為中國傳統社會固有的所謂「超穩定結構」，更有人將原因歸結為滿清政權的強權扼殺。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的王權主義》解剖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運行、操作機制和相應的文化系統，詳細分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橫斷面，部分地揭示了人文主義的中國傳統社會所以長期遲滯的歷史原因。

中國傳統社會在歷史上沒有自發地走出中世紀的決定性因素是她內在的某種本質特徵，這種本質特徵就是「王權主義」，它用重重的套子束縛住了傳統中國的手腳。《中國的王權主義》從三個方面解釋「王權主義」的含義，認為「王權主義」既是一種政治權力，又是一種社會結構，還是一套思想觀念。「王權主義」的三重涵義恰好說明了中國傳統社會受到三重套子的重重限制。

中國傳統社會的第一重「套子」恰恰就是政治權力。劉澤華先生認為，政治權力在傳統社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掌握了政治權力的官僚老爺還有什麼事不歸他們管呢？他們『為民父母』，行政事務要管、經濟財政要管、日常禮節要管、斷案要管，其他諸如老百姓種什麼莊稼、蓋什麼樣的房子、梳什麼髮型、穿什麼服飾等等都要由他來管，真可謂無所不管！」中國古代的政治



書名：中國的王權主義

作者：劉澤華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上海

出版日期：2000年10月

頁數：484頁

ISBN：7-208-03437-0

權力操縱在一個以王—貴族為核心的利益集團手中，因此這種籠罩一切的政治權力說白了就是君主專制主義的皇權或王權。無所不管的皇權或王權，以權力方式主宰、支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破壞了社會應該遵循的簡單再生產規律和價值規律，進而導致了中國傳統社會不能產生新的突破，不得不長期遲滯在傳統階段。

中國傳統社會的第二重套子則是由第一重套子派生的社會結構系統。劉先生認為，中國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就存在著一個顯赫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員隨著王朝更替不停地更換著，但是這個結構卻十分穩定，他們是主宰、控制整個社會的行為主體。中國歷史上的各個封建王朝幾乎都是靠刀劍砍出來的，即所謂「馬上得天下」。新王朝的建立總要形成新的王權系統，進而形成新的勢力集團。新勢力集團的形成往往伴隨著財產、地位的社會再分配，並因此而形成新王朝的社會結構系統，這個系統在特徵及社會作用方面與以前的王朝並無根本差異。這個結構保證了王或皇帝的絕對支配或佔有社會財富的權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統治集團通過政治權力把社會財富聚集在自己周圍，形成一個非常堅固的「套子」，它使得新興的產業被舊的方式同化或吞噬。社會新興的事業及組織都被社會的固有結構同化，從而失去了在組織及結構上進行突破的能力。

中國傳統社會的第三重套子就是一套宣揚君主萬能、君尊臣卑等觀念或心理的社會文化系統，它提供給人們生活的範式和相應的價值皈依，使

得一定的社會生活能夠維持得住，並繼續進行下去。它給上述兩重「套子」提供本體論上的合理證明。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一個重大創造就是一套相對完整的君主專制主義理論體系，它奠定了兩千多年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的基礎。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堅持了人文主義的立場，但是中國傳統所謂人，只有一個標準模式，這就是所謂聖人，而中國傳統所謂「成人」也暗含著普通人只有在聖人的教導、指引和督促、強制下成為真正的人。普通人只能匍匐在聖人的胯下，聽任聖人的支配和主宰才能成為人。知識份子是給社會提供整體理想的母機，如果知識份子在夢中也不能出現新的社會操作、控制方式，那麼，人們在按照知識份子提供的方案改造社會時也就很難有什麼突破性創造。社會文化系統的王權主義是知識份子一手創造的，它不但束縛住了人們改造社會所必須的想像力，而且讓人們走上了以前的老路而不自知，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進一步遲滯。

中國傳統社會長期被這樣的「套子」籠罩著，以致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都或多或少的「套子化」，即「經學化」了。經學化思維一方面播撒了社會的價值追求，另一方面也普及了社會價值理想的標準格式。中國傳統社會高舉的價值理想固然令人肅然起敬，但是，它的目的僅僅是作為整體存在的人的類整體，個體實現其價值的方式僅僅是服從類整體對他的要求，其核心動作乃是「從」。君主從「天命」，小民從「君子」。這樣，社會就集體塑造出了一種普遍認同，並個個努力皈依的無我、無欲、無私的

聖人境界，每個人都在群體為他劃定的固有格式上喜怒哀樂、舉手投足，非禮勿動，非禮勿言，甚至連思想也以「思不越位」為理想佳境。鴉片戰爭以前，每當面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人們進行理論和機制創新的激情不止一次地高潮疊起，遺憾的是思想家缺乏必要的理論和實踐資源，難以為社會整體和普通社會成員確立新的容納個人自由的存在形式，他們只能像玩魔方似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玩思想前輩們一再把玩過的老把戲，繼續為現世王權製作精美的紅嫁衣。

中國真正開始突破傳統的三重「套子」是在鴉片戰爭以後的近代，風起雲湧的歷史運動引進了許多傳統「套子」中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新鮮東西，它們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既有的王權主義的社會結構系統、政治權力系統和思想觀念系統。中國近代社會是傳統王權主義隕落的歷史時代，其歷史結果就是辛亥革命締造了共和國，五四運動成就了新文化。新文化運動中出現了許多鞭撻傳統專制主義體制及傳統儒家奴性思想的健將，陳獨秀、李大釗、吳虞、魯迅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為中國自覺從傳統王權主義的套子中走出來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但是由於中國缺乏一場嚴格意義上的思想啓蒙運動，幾千年專制主義體制和思想文化的遺毒還是或隱或現地存在於我國的社會生活中，「文化大革命」便是這種專制主義遺毒的集中爆發，社會一度陷入了「吃人」的瘋狂狀態。「吃人」促使人們更進一步深入思考中國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劉澤華先生從中國社會現實（特別是知識份子沒有自我）的苦難受到

啟發，系統梳理中國傳統的統治理論，並進而闡明中國傳統社會把人裝在固定的套子裏消滅其自我的「吃人」的本質，《中國的王權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了「五四」一代學人對傳統社會「吃人」現象的直面控訴，乃是「五四」反專制傳統的學理繼續。王權主義絕不是中國傳統的全部內容，但它卻詳細規定了社會和個人的存在形式，並規定了人們實現價值追求的形式和途徑等。中國傳統社會的「吃人」，顯然不是沒有高尚的價值追求所致，而是因為價值追求長期只有王權主義一種追求方式，個人除了能動性之外已經一無所有，他只能用能動性把自己奉獻給王權主義。這就是《中國的王權主義》反覆要闡明的一個歷史真實。◆

林佳龍主編

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

沈有忠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壹、內容簡介：本書由數位學有專精的學者合寫，各篇主要內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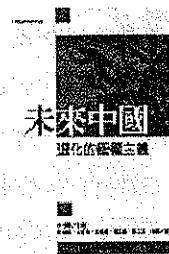
(一) 童振源：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轉型與挑戰。

關於中國的經濟成長，雖然官方的各項數字有些浮誇，但經濟成長確實是顯著的現象，其主要因素在於生產要素的增加，而維持高成長則仰賴於市場化為基礎的優化資源配置以及提高技術管理。然而，經濟轉型的成敗也面臨下列嚴峻的挑戰：1. 北京財政問題的惡化；2. 國有企業體質的不健全；3. 國有銀行的潛在危機；4. 農村發展、成長與農民收入帶來的「三農問題」；5. 日益嚴重的失業與剩餘勞動；6. 所得分配的差距與城鄉失衡的逐步擴大；7. 欠缺社會安全體系的建立。在這些挑戰的威脅之下，中國面臨的是經濟轉型的成敗問題，如果未來經濟成長的速度減緩的話，將很可能從內生的金融危機引爆，連帶衝擊社會穩定與政權的維繫。

(二) 陳志柔：中共十六大後的社會情勢分析。

中國的改革在社會發展上取得顯著的成果，但社會的不平等卻急遽擴大。這些不平等表現在貧富差距、城鄉差距以及東西差距等「三差」上面，也具體表現在三農問題以及城市的下崗失業嚴重。這也使得社會上發生越來越多的日常生活形式的反抗運動，特點包括群體事件增多、對抗性增強、利益矛盾突出、發展趨勢複雜多變等。雖然如此，統治菁英佔據制高點以操縱社會不滿的流向，使得跨區域性的集體行動至今仍難以出現。中國的未來充滿緊繃的氣氛，政權發生危機或是「拉美化」成為政經發展的方向。

(三) 林岡：中共的理論創新和意識形態轉型。



書名：未來中國

編者：林佳龍

出版者：時報出版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3年12月初版

頁數：240頁

ISBN：9571340162

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以「三個代表」、「政治文明」來強化其正當性。在政黨轉型方面，中國共產黨正從革命型執政黨轉向發展型執政黨，特徵在於市場經濟與混合所有制為基礎，以實現小康社會為執政合法性的來源。三個代表的提出則是重新塑造黨的社會基礎，形成政治、經濟與知識三種菁英三位一體的架構，而政治文明的提出則是在政治制度上放鬆傳統的「體、用」之爭，希望能以更具彈性的理論基礎來吸納西方國家的經驗。中共的意識形態與理論基礎受到經濟成長的影響而轉型，以建立新的正當性基礎，但是「一黨領導」的底線仍未放鬆，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也並未因此而到位。

(四) 董立文：從權力繼承看中共政治發展的非制度化。

文章針對制度化為核心，討論中共政治體制是否符合制度化的特徵。基於對「制度」的定義不明確使不同的討論可能形成極具差異的命題，而中共的研究經常出現兩種方式，一是討論政權本身的制度化，一是討論政治的制度化，這兩種討論的同時存在是誤導了讀者對中共政治的認知。對於中共的觀察，多數的文獻所討論的是在現代化的範疇之內，而不是制度化，從十六大的權力交班過程，也證明中共的權力繼承確實未達制度化的要求。因此，在中國研究上，制度不能被中性化，而行動不能等同於制度，新制度主義的研究其解釋力恐怕還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理論。

(五) 徐斯儉：退化極權政體下的有

限改革。

中共政權存在國家、經濟、社會三者之間的潛在共識（潛規則），胡錦濤上台後的基本選擇是改變社會潛規則來緩和危機。中國在九〇年代進入一種「退化極權政體」，具體的表現就是建立「發展型國家」的角色。這樣一個退化的極權政體在社會上因為經濟的發展出現利益多元化與兩極化的現象，公平與正義的潛在危機成為政權繼續發展與維持的最大挑戰。因此，胡錦濤上台後以堅持市場經濟發展、強調社會正義與堅持共黨領導的三項原則為基礎進行「有限改革」，內容包括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三分、黨政任用制度改革、行政責任制、黨代表大會常任制、紅頭文件與行政規章的審查、鄉鎮長選舉試點等。欠缺社會利益菁英的參與，有限改革的成果可能也十分有限。

(六) 林佳龍：中國的國家戰略與對外策略。

文章對於國際戰略環境作者提出了五個主要特徵，包括和平與發展的趨勢不變；一超多強的格局延續；經濟全球化的聯繫增加；國際體系的多元化；反恐與亞太地緣戰略的重組。中國的戰略目標則設定為加速現代化與提升國力；挑戰美國霸權與建構多極秩序；擴展週邊範圍與成為區域強權；維護領土統一與恢復光榮歷史。而其手段則是透過大國外交、睦鄰政策與海綿戰略。在這樣的戰略架構下，戰術則有所調整，包括從武力解放到和平統一；堅持一個中國但內容調整；拒絕國際壓力轉為引進國際壓力；加速經貿整合以通促統。這種戰

略不變，但戰術靈活的對台策略，十六大以後的中國國際戰略以及面對台美中三角關係上，都是以現實主義在與國際秩序進行理性的互動。

貳、討論：

本書名為「未來中國」，在落題上即已假定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必然發生變革，而這樣的變革則是立基在從八〇年代以來歷經二十餘年的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之上。然而，究竟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的能量積累到何種程度會引發政權結構性的變化？又會朝向那個方向變化？將會給台灣帶來哪些衝擊？這些變化與改革開放之間的關係為何？這些問號都是在討論「未來中國」的問題上十分引人關注的議題。幾位對中國素有專精的作者，除了深入的揭開中國歷經二十餘年的改革開放後的現貌外，也提出作為一個極權政體其政權維繫的挑戰與未來的可能。

在這之中，最主要被提及的現象是中國經歷長期經濟發展，造成新興的利益階級，同時也積累了社會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問題，這兩個現象成為經濟繼續發展、社會正義維持、意識形態轉變、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變數，面對未來的繼續發展與政權維繫，如何吸納新興的利益階級以及減少社會不平等的壓力成為中國的當務之急。

中國的改革開放到九〇年代末期，其作用力已經開始對政權產生壓力。本書對於未來中國的經濟持續成長、社會結構與政治改革等議題上，持相當謹慎而保守的預測，只是，更令讀者們感到興趣的是，究竟改革開

放帶來的壓力其迫使政權進行更大規模的改革或是社會發生解構與重構的變革，其臨界點究竟為何？童振源、陳志柔、徐斯儉等三位教授的觀察，建立了改革開放對經濟持續成長、社會結構重組、政治制度改革等的連結，這是一組動態的過程，也是一組持續進行中的變化過程，這樣的變化究竟在什麼程度下可以持續，而這個政權所能承載的臨界點如何被判定並解釋，是另一個值得關心的議題。而林岡討論的意識形態，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一項重要的統治基礎。這些意識形態的轉變，落實在經濟、社會、政治、國際戰略的發展上有何解釋能力？這也是身為讀者的所好奇之處。董立文對於中國研究提出了方法與定義上的批判，這是一個解釋層次與層面的問題，對於不同層次與不同層面的中國研究，如何以一個更有效的理論將這些討論包容進來，可能是一個值得嘗試的工作。林佳龍對於中國國際戰略的討論，做了歸納性描述，也做了些微的前後比較，這樣的觀察對台灣而言是必要而重要的，只是在這樣的歸納與敘述之後，是不是能找到一組理論架構來解釋中國國際戰略調整的邏輯，可能也是一項重要的討論。

總之，對於當代的中國，正如徐斯儉在書中所建立「退化的極權政體」的概念，這個極權政體的退化是現在進行式，他的未來不僅是台灣所注目，也是全球關心的焦點。◆

Joseph S. Nye, Jr. &
John D. Donahue, 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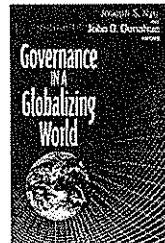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楊昊／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近年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席捲了中外學界，同時亦被許多研究領域引以為領導研究的重要典範（paradigm）。事實上，學術界針對全球化所進行的研究頗為多元，無論是文化研究、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抑或是管理學的視野，皆嘗試針對頗為抽象的全球化概念進行更為具體的分析與論述。對於政治學中之國際關係次領域而言，有關全球化的研究從早期對於全球互賴現象之探討與全球主義（globalism）發展之分析，逐漸轉移到「如何治理」的命題上，此種不斷落實的演進過程，正象徵著全球化研究中一道愈益務實的研究趨勢。而《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書，更清楚揭示了隱藏全球化浪潮中的這條理路。

本書係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研究計畫「二十一世紀的治理視野」（Visions of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的成果彙集，共收錄十六篇文章。導論部份由 Robert O. Keohane 與 Joseph S. Nye, Jr. 兩位大師執筆，以「全球化如何被治理」（p. 1）作為全書寫作的概念架構，並進一步透過分析層次（level-of-analysis）的觀點來整合全球化與國內治理（向下深入）（pp. 12-19），以及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網絡（networks）、規範（norms）（向上連結）的關係（pp. 19-36），從而揭示全書的分析架構。在章節安排上，本書主要可分三個部份：宏觀的全球化趨勢分析、全球化對國內治理的影響、以及以多元行為者之角色為核心的全球治理。

本書的第一個重點是針對不同議題領域中的全



書名：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編者：Joseph S. Nye, Jr. and

John D. Donahue

出版者：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出版地：Washington, D. C.

出版日期：2000 年

頁數：368 頁

ISBN：0-8157-6407-3

球化趨勢分析。Jeffrey Frankel 首先針對一般認為最能彰顯全球化效應的經濟議題，透過計量研究途徑來探討全球化過程對貿易與金融的影響，並強調全球化不但對經濟成長有利，對非經濟面向之發展亦有所助益（pp. 45-71）。其次，在較為敏感的安全議題上，Graham Allison 透過五個網絡模型來重新詮釋全球化對國家與國際安全的衝擊（pp. 72-85）。此外，在環境議題方面，William C. Clark 則是援用 Keohane 與 Nye 的概念架構來探討環境治理之全球化的發展，並進一步強調環境理念將會對世界事務造成深遠的影響（pp. 86-108）。而在較為深層的社會與文化面向上，Neal M. Rosendorf 先從宏觀的角度探討文化全球化的本質，並針對作為當代全球文化重要輸出者的美國及其軟性權力（soft power）進行評析（pp. 109-34）。最後，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與 Deborah Hurley 試圖從網絡的範圍、內容的深度以及對經濟的衝擊來評析全球傳播革命，並指出傳播革命將會對國家經濟成長與全球經濟秩序帶來正面的助益，同時亦將對國內治理與國際事務中的潛在權力移轉造成衝擊（pp. 135-51）。

本書的第二部份主要處理全球化對國內治理影響的課題。Pippa Norris 嘗試處理全球治理中的公民與認同問題，Norris 採用《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資料，指出文化變遷中最重要的指標是不同世代的人民所持之不同國際態度，並進一步認為都市化的成長與教育水準的提升都將有助於世界公民對全球化的認同（pp. 155-77）。在此種「異中求同」的前提下，Merilee S. Grindle 重探經濟全球化

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Grindle 在文中亦指出不甚穩定的經濟成長、普遍性的貧窮、不健全的制度以及在科技研發上的範圍與分佈的侷限等四個因素，都將為開發中國家在面臨全球化衝擊時帶來諸多變數（pp. 178-207）。此外，Tony Saich 則是進行全球化與治理對威權國家之影響的個案研究。以中國為例，Saich 指出威權政體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將在主權上進行讓步，無論是向上（國際制度或其他多元行為者）或向下（公民社會或地方政府）讓步，傳統威權治理模式都將因而備受侵蝕（pp. 208-28）。¹循著全球化衝擊國內層次的思路，Elaine Ciulla Kamarck 選擇針對 123 個國家在新公共管理或政府改造運動中所推動的革新活動，進行整體性的回顧與評析。不過 Kamarck 對於此一源自於二十世紀末期的公共管理革命之成效，仍持保留的態度（pp. 229-52）。最後，在一般認為全球化程度最低的法律面向上，Frederick Schauer 則針對法律移植（legal transplantation）一題進行論證（pp. 253-68）。

本書第三部份主要處理全球主義下的治理問題。此一治理問題涉及面向較為複雜，其中 L. David Brown、Sanjeev Khagram、Mark H. Moore 以及 Peter Frumkin 等四位學者指出，全球化過程形塑了公民社會與非政府組織

¹ Saich 在文中針對中國大陸參與全球化的過程提出諸多評析，指出中國希望由全球化獲得總體經濟利益，卻對全球化所產生之成本有所不適，如社會、政治與文化的重新調整（p. 209）。有趣的是筆者曾在坊間發現《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一書之簡體中譯本，翻閱後發現譯本未收錄 Saich 的文章（第九章），或許大陸學者認為 Saich 的評述有失公允，但此一未完整收錄的譯本確實使該書之精神失色不少。

的發展，同時亦進一步強調在未來的全球治理中，跨越國家、市場與公民社會的多部門關係將會是相當關鍵的課題 (pp. 271-96)。特別在國際層次上，Cary Coglianese 重探了全球化與國際制度的關係，Coglianese 強調制度的選擇與設計將有助於制度的有效性，進而影響治理的過程 (pp. 297-318)。除了操作型的務實分析外，Arthur Isak Applbaumh 則由規範性的觀點切入，他從道德哲學的觀點來論證全球化對於認同與合法性的影響 (pp. 319-29)。另外，在目前備受注目的資訊與網路議題上，Deborah Hurley 與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討論了全球訊息網絡中的治理問題，並指出國家應面對在全球化下有關資訊政策的制訂與管制問題 (pp. 330-46)。最後，Dani Rodrik 指出在全球化的衝擊下，當市場不斷追求全球性的同時，支持市場的國際制度仍擺脫不了國家性。Rodrik 嘗試透過全球聯邦主義 (global federalism) 的觀點來解決此一擺盪在全球市場與國際制度的兩難困境 (pp. 347-65)。

淺析本書，第一部份是以「議題範疇」(issue-areas)來作為分析全球化趨勢的切入點，諸如此類之文獻，在全球化研究中亦可說是卷帙繁浩，不勝枚舉。不過這五篇文章仍有其功能：此即指出管理全球化的重要性。第二部份則嘗試分析現代國家在全球時代中所需具備的調適能力。到底國家是否將因全球化而衰退 (retreat)？還是在被賦予新的角色與權責後，重新站在全球化的浪頭上？確實值得吾人深省。第三部份則正式處理全球治理之課題，全球治理同時涉及國際、國家、國內結構與個人層次之分析，

是故在研究方法勢必面臨跨層次分析 (cross-level-analysis) 之問題。就此，本書亦給了讀者些許啟示：如何以一套核心論述跨越不同分析層次，為全球治理提出一套較為務實的實踐模式，實不容忽視。依循上述三個部份，我們或可發現一條隱含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治理」理路：全球化趨勢（國際層次）→ 對國內的衝擊（國內層次）→ 全球治理（跨層次的互動與交互影響）。事實上，此一理路的建構與提出係本書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國際關係研究者而言，該理路將具有兩個重要的意涵：(1) 更為務實的研究導向：這意味著研究導向將由全球化概念層次的趨勢分析，逐漸轉向操作層次的「如何管理」來發展；(2) 理論整合 (synthesis) 的研究基礎：在研究全球治理時，研究者勢必面臨不同分析層次的理論互動問題，從而將可能朝向諸如 K. J. Holsti (1989) 與 G. John Ikenberry 與 Michael W. Doyle (1997) 等學者所提倡之理論多元論 (theoretical pluralism) 之途徑發展。

除此之外，科際整合的研究途徑亦為本書的另外一個特色，本書針對幾個與全球化相關的概念問題（如國際制度的責任與功能、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性、認同問題與開發中國家的發展），以不同領域的觀點來切入並進行細膩的探討與評析。鑑於此，讀者除了能釐清全球化與全球治理之共生結構外，亦能瞭解在不同議題範疇中的治理問題。本書透過上述這兩個特色，提供對於全球化與全球治理有興趣的研究者，更為多元的實務知識與更堅實的學理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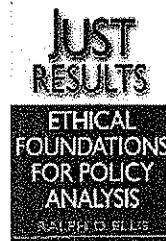
Ralph D. Ellis

Just Result : Ethical Foundations for Policy Analysis

劉昭博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生

雖是重彈「分配正義」與「集體福祉」價值先後的舊調，但 Ellis 試圖以「結果論」(Consequentialist)¹結合「非功利論」(Nonutilitarian)²建構其分配理論。Ellis 的理論是以「分配正義」為優先價值的決策原則，認為「善」具有「使用價值」(use value) 及「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成本效益分析」的錯誤即在以集體平均「交換價值」為決策原則，因而嚴重損及弱勢者的利益；Ellis 的分配理論則是以「善」對個人本身的「使用價值」為基礎，強調即使相同的「善」，或「政策」，對每個人的價值程度(或謂「需求程度」(degree of need))不同，因而不能純以集體的市場價值作為判斷依據。

正因經濟地位的不同，「財富效果」(wealth effect) 將會影響每個人的「使用價值」，要如何衡量每個人的「使用價值」？Ellis 認為可以「職業風險趨避」(occupational risk-aversion) 計算出「邊際效用遞減率」以測量「有價」及「無價」價值的需要程度，換言之，可計算出最弱勢者的「使用價值」及「需求程度」，並可依此得出符合分配正義原則的「風險承擔補償」，如此可兼顧弱勢者願以承擔風險換取個人經濟福祉增加的分配正義。Ellis 以 Sinden & Worrell 的效用模型為基礎： $V_i = \sum_{i=1}^n (U_{ij} \times WT_j)$ ，將



書名：Just Result: Ethical Foundations for Policy Analysis
作者：Ralph D. Ellis
出版者：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Washington, D. C.
出版日期：1998 年
頁數：
ISBN：

¹ 使用「結果論」一詞，表示最終分配結果是否符合正義才是 Ellis 所關注的重點，分配過程是否符合正義，以及分配過程應如何設計，則非 Ellis 所重視。

² 推測 Ellis 使用「非功利論」一詞目的，應只是為與重視集體福祉先於個人的傳統「功利論」有所區別，然其所建構的分配數學公式與「效用函數」無甚差異，加諸套用「邊際效用遞減」原則，Ellis 的分配理論與傳統功利論實無甚差異。

個人的 WT（重要性權重）改成個人 DN（需要程度）， $Vi = \sum_{i=1}^n (Uij \times DNj)$ ，其指數性而非算術性變化的曲線形狀，可作為需要程度重要與否的判斷標準。

由於 Ellis 的分配正義建築在個人的「職業風險趨避」，因此個人如何衡量「風險」成為理論量化的重要關鍵。Ellis 雖為「價值必要程度」提出嚴謹而符合邏輯的區分原則，然而對於「風險」和「不確定」(uncertainty) 的區別，卻落入「科學哲學」的理論建構問題。

Ellis 認為雖然任何社會科學研究都無法避免碰觸到「不確定性」問題，甚至連政治哲學，乃至政府政策都受其影響。然而「不確定性」在解決集體行動問題上，卻另有涵義。Ellis 認為「權利基礎論」(Rights-based) 和「最小政府理論」(minimalist) 在解決集體行動問題上顯得毫無效果，因為純粹的權利基礎途徑將會限制政府的力量；要求政府在採取干預行為時必須遵守更嚴格的科學驗證標準；而且通常伴隨分裂的地方政府與政府職能 (Ellis, 1998, pp.173-74)。

Ellis 以為權利基礎和最小政府途徑傾向要求「素樸—唯實論者」(Naïve-realist) 的科學驗證觀，例如要在科學上證明某人受到傷害，就必須證明遭受危險科技或物質的傷害、或是因為企業併購、或是因為環境的毀滅，簡而言之就是必須有具體的證據證明傷害行為的存在。但是「結果論者」和「高度集權化」途徑僅要求科學驗證標準建立在適當科技及物質傷害可能性之上，並使立法者因此受

到激勵以採取控制及禁止行為。中央政府集權之所以變得重要，乃因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流於為追求投資商機而僅願意維持最低限度的公共利益保護，例如地方政府通常為了吸引投資而犧牲環保。

在 Ellis 看來，權利基礎和最小政府途徑傾向要求「素樸-唯實論者」(Naïve-realist) 的科學驗證觀，將無法避免科學研究的「不確定性」問題，對政策分析家而言，在詮釋科學發現時，或多或少都無法避免個人價值假定的滲入。由於科學研究都含有某種形式的推論，因此在「價值假定」與「事實假定」間永遠留有不確定的空間。要達成知識在經驗上的可信度，至少有四個基本要求：一、一個可以驗證假設的預測；二、要求精確適當的量化方法，以決定問題關係是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三、適當的運作化定義，以使所欲調查的變項得以從事經驗觀察與測量；四、透過觀察到的統計關係排除看似合理的替選解釋。前述四項基本要求都留有「不確定性」存在空間，因而使得研究必然受到研究者個人價值觀所驅使。

討論完不確定性問題後，Ellis 以 Rawls 式的「弱勢優先原則」分配正義論做結。Ellis 提出「生命」為無價的優先價值，但是弱勢者為求生存發展，可以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原則，給予最弱勢者多承擔風險的補償，而補償可以經濟學者 Viscusi 研究的「十倍」原則給予補償，並可作為決策者的決策原則。

綜觀第六及第七兩章，Ellis 可謂希望以一己之力，解決百年來困擾政治學者、經濟學者、社會學者與方法

論學者的棘手問題，個人自由與社會正義如何平衡。在本書第四章以前作者所整合的各種論證與作者個人的批判尚均屬「切中時要」，然自第五章起 Ellis 企圖導入 Rawls 式的改良分配正義理論時，即顯出理論內含與經驗驗證的捉襟見肘。

經濟學對於風險與不確定性在概念上有所區別。風險並非對於所處情境全然無知，而是可以計算其各種可能性發生的機率，但行為者無法肯定當下所處情境將會發生何種事件，僅知其發生機率。Rawls 於 1992 年版之正義論一書中，所提「原初狀態」及「無知之幕」即指對於風險訊息的排除，使得行為者在沒有風險考量下，從事毫無偏見的分配行為³。換言之，Ellis 的「職業風險驅避」論述是採取經濟學者的觀點，認為勞工對於從事職業的風險最為瞭解，或可擴大解釋為行為者對於所處情境，所欲採取行為，其所必須面臨之風險皆有所了解，且在政府儘量排除任何危害人民生命的可能後，針對經濟弱勢者從事高風險工作給予「志願性償付」(willingness to pay)，以補償其承擔風險之損失。雖然 Ellis 修正以個人經濟地位為主的比較原則，改以勞工家庭收入作為衡量經濟弱勢的標準，但 Ellis 却忽略勞工在就業選擇上並非僅考量職業風險，還需考量個人工作能力及整體就業環境；同時面對不同風險承擔能力的個人，政府無法以 Ellis 單純的「十倍」作為自願性償付的給付標準，同為經濟弱勢，風險偏好者願意接受僅比一般水準稍高的薪資，

風險趨避者即使薪資再高也不願接受，因此政府雖可就勞動條件或風險條件給予分配性正義性的補貼式轉嫁，但不能保證提高經濟弱勢者從事高風險工作以改善經濟地位的興趣。

由於 Ellis 忽略市場機制的自然供需調節，因而無法正確處理不確定性所導致的分配正義問題。不確定性的問題其實在於「訊息不對稱」(asymmetry of information)。訊息取得不僅需要耗費成本，且因為個人訊息獨享而有「隱藏訊息」(hidden information) 問題。Ellis 所提出的汙染致癌例子，正說明易取得訊息者可以即早採取行為降低風險，政府承擔訊息成本的能力較高，理性的政府偏好以社會整體平均為考量，利益驅使的政府偏好以企業利益為考量，結果都使弱勢者權益受損，因為弱勢者無力取得相關訊息而採取風險規避行為。

因為 Ellis 沒有區分在完全訊息與非完全訊息下之風險規避行為，其所主張之分配正義理論恐淪為：一、北歐國家式以「國家力量」主導資源分配的福利國家，但因 Ellis 強調結果論而非初始發展條件的平等，分配結果將更接近共產主義式國家的福利制度；二、因為由政府決定「必要程度」，且零風險為目標（生命優先），生產成本將大幅提高，不僅可能因為資本外逃而加深邊陲國家的經濟剝削，國內生產亦可能因為缺乏利潤而停滯；因此，在分配正義與集體福祉之間，不應該採取結果論的思考，而應該就分配與集體福祉提昇過程是否符合「弱勢優先」及「正義原則」為考量，並將訊息成本降低至最弱勢者可接受標準，方有可能兼顧發展與平等。◆

³ Rawls 在書中曾舉囚犯困境為例，說明在訊息不完全下，人類選擇的不理性。

龍應台

面對大海的時候

馮先祥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龍應台的〈在紫藤盧和 Starbucks 之間 — 台灣的內向性〉與〈五十年來家國 —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¹〉兩篇文章所引發的辯論幾乎是 2003 年下半年華文世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經過大約半年的論戰之後，龍應台將相關的討論集結成這本《面對大海的時候》。內容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是龍應台自己的立場與主張。第二部份是整理了數篇針對龍應台的論點進行討論的文章，可謂這場辯論的精華。第三部份則是關於讀者對於那兩篇文章的讀後心得感想。這本書可謂為瞭解此次文化論戰的最佳參考書。

本書選錄四篇龍應台的文章，成文時間則稍早於〈在紫藤盧和 Starbucks 之間 — 台灣的內向性〉一文。分別是：〈當本土文化放出光芒〉(1999 年 11 月 6 日)、〈冷眼素書樓〉(2002 年 3 月 29 日)、〈兩個文人在台北〉(2002 年 10 月 1 日)、以及〈當權力在手〉(2003 年 6 月 1 日)。這四篇文章可以說是〈在紫藤盧和 Starbucks 之間 — 台灣的內向性〉的序曲；很多在〈紫〉文中所呈現的觀點，已於這四篇文章中展露雛形，例如什麼是國際化等；只是文字的敘述沒有那麼詳盡。

在〈當權力在手〉中，她說「筆」是一種權力的象徵，既可分辨是非，亦能混淆是非。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後，她捫心自問，「龍應台，你是不是應該把筆從『鞘』中拿出，把是非說個清楚？」這一句話或許能解釋她為什麼要引發這次論戰。在這次



書名：面對大海的時候

作者：龍應台

出版者：時報出版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3 年 12 月

頁數：336 頁

ISBN：9571340073

¹ 〈在紫藤盧和 Starbucks 之間 — 台灣的內向性〉於 2003 年 6 月 13 日刊載於《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另外，事實上，〈五十年來家國 —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是分為（上）、（中）、以及（下）三篇連續在同年的 7 月 10 日～12 日也刊載於《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

論戰中，龍應台主要的觀點都表現在〈在紫藤盧和 Starbucks 之間 — 台灣的內向性〉、〈五十年來家國 —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以及〈面對大海的時候〉等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算是初版，後兩篇則是回應批評的修正版，但是三篇文章所要傳遞的訊息是相當一致的，主題都在辯證傳統文化與全球化的關係。

龍應台認為，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必須在全球化時代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可惜的是，台灣今天非但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在社會又出現許多失序的現象。在她的文字脈絡下，「全球化」和「國際接軌」的意思是一樣的。龍應台認為，台灣要全球化或國際化，應該告訴其他人台灣不一樣的地方在那裡（紫藤盧的比喻）；而不是把自己變得和別人一模一樣（Starbucks 的比喻）。簡單地說，台灣的全球化應該是雙向的，包括出口與進口。因此，她反對台灣單方面地接受歐美文化（特別是美國）。台灣膚淺地移植西方的外來文化卻忽略背後深層的文化意義，例如，聖誕節移植到台灣後變成商業炒作的噱頭，原本的宗教意義卻消失了；這樣膚淺地吸收反讓人感到不倫不類、東施效顰。

在此同時，台灣政壇又有一群標榜「本土化」的人，強調「本土意識」，企圖利用政治力量切斷台灣與中國在文化上的關連。這群人在龍應台的眼中與戒嚴時期的獨裁者沒什麼兩樣，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她認為，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中相當重要的成份，也是相當珍貴的一部份。「本土化」不同於「去中國化」；而中國共產黨政權和中國文化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

係。也就是說，政治與文化要分開。台灣必須懂得利用中國文化的資產才有辦法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筆者認為，這樣的觀點與林毓生的「創造性的轉化」²有異曲同工之妙。後來龍應台所遭受的批評大多集中在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的關聯此一課題上。所以，她之後的兩篇文章，〈五十年來家國 —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以及〈面對大海的時候〉，逐漸修正她的立場。雖然她還是堅持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可是她已經不再那麼刻意地強調中國文化在台灣的獨佔地位。

在後兩篇文章中，龍應台比較接近多元主義的立場，但她仍然反對偏頗的「本土化」或「去中國化」。她認為，台灣文化有很多組成元素，中國文化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不應該任意地否定或排斥。那樣偏頗地「去中國化」無法在全球化時代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只能被動地、膚淺地接受外來文化；用她的詞彙來說，就是「文化精神分裂症」。反之，應該效法海洋的包容去接納中國文化，取代「本土化」的封閉與狹隘。

簡單地說，除了在「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的題目上有著不同強度的辯證之外，龍應台的論述在這幾篇文章中一脈相貫；她認為，一個國家（台灣）或一個人必須擁抱傳統文化才能真正地面對全球化。至於台灣的傳統文化是什麼，她的想法經過某些調整，後來比較接近多元主義的立場，但仍不放棄中國文化在其間的重要性。

² 請參考林毓生，《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1983）。

對於龍應台的回應來自四面八方。這些回應，不論是反對或贊成，辯論焦點幾乎都集中在「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上；反對者多半認為龍應台過度地強調中國文化在台灣的重要性，但卻鮮少關懷龍應台論證的另一部份，也就是「全球化與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的關係」。缺少這一塊的討論，似乎讓這場大辯論少了些什麼。龍應台很簡約地將國際化與全球化劃上等號，然後大聲疾呼必須要先擁抱傳統文化才能國際化，才能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站穩腳步。筆者認為，至少還有另一種論述邏輯的可能性：全球化和傳統文化是互相衝突的，要國際化就必須先捨棄本身的傳統文化。龍應台的論述，似乎把多元主義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可是，她並未在「全球化與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的關係」上建立更細微的論述邏輯，使紫藤盧和 Starbucks 間的強烈對比則失色不少。這組關係的證明是最根本的，龍應台在這個部分的論證不夠精緻，其他人的回應也沒有討論這個問題，實在太可惜了！

此外，龍應台並未收錄全部的回應與感想，也許是因為有些回應的措辭太過激烈的緣故吧！筆者認為，如果可能，龍應台應該把所有的回應盡可能地收錄。或許其中某些回應太過激烈，但「激烈回應」本身便是一種台灣現況的反映。果能如此閱讀所有回應，便如身歷其境般，其間感受和冷眼旁觀大不相同。

順道一提，筆者建議讀者閱讀此書之時，能留意一下文章的時序，如此更能輕易掌握整個辯論過程。

最後，筆者以龍應台的一段文字

做總結。有沒有參與這場辯論不重要，立場是什麼也不重要，但是，龍前局長推薦的旅遊路線一定有相當的價值與意義，千萬不可以錯過：

「懂得探索城市的人，來到台北，可以這麼走：從北端的故宮往南，經過張大千故居、錢穆、林語堂故居、走過有史前遺跡和清朝古墓群的芝山岩，到規劃中的士林音樂廳，在蔣宋故居和官邸花園休息一下，再折向台北故事館、美術館，流連一下台北之家，逛到後面蔡瑞月舞蹈社的日式建築和當代藝術館，看一看左邊的國際藝術村，拐幾個彎到一下二二八紀念館，再往南到紫藤盧喝杯茶，最後在寶藏巖的青青草坡上坐下來看夕陽下山。走完這條貫穿南北的軸線，他已經窺看了整個台北文化史：有古典的中國，有草莽的台灣，有殖民的日本，有驕傲的美國；有歷史的傷痛，有重生的歡悅；有菁英的石破天驚，有庶民的胼手胝足。」（頁 60）◆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戴天楷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戰爭與和平，堪稱國際關係學最重要的主題；甚至可以說，研究國際政治的目的便是在避免戰爭發生。對 Nye 而言，要準確掌握國際政治的互動邏輯，莫過於從理解國際衝突出發最為便捷。Nye 在處理這個題目時，暫時放下他長期以來所主張的自由主義，反以現實主義觀點作主軸，輔以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觀點，建立起一個更宏觀的分析架構，解釋為何會發生國際衝突。他從現實主義者最常引用的歷史個案—伯羅奔尼薩戰爭 (Peloponnesian War) 一開始這本書，一方面這是個現實主義理論運用的經典個案，也是國際關係學者所要認識的第一場戰爭；饒富趣味的是，在另一方面，他對 Thucydides 提出若干質疑，暴露出現實主義過度簡化國家行為的推論確有其不足之處；在這些現實主義所無法提供有效解釋的部分，就需要其他理論的輔助，並更廣泛的蒐集資料，以利研究的周延，並更深入理解衝突個案發生的脈絡。

雖然 Nye 著作此書的目的是提供國際關係學生從理解國際衝突開始，以認識國際政治互動邏輯的教科書，但在寫作上卻不若許多教科書，總企圖含括領域中所有內容，卻不斷堆疊章節，讀來令人索然無味；反之，本書不僅在理論引用上能首尾呼應，在方法論上，更是精彩之處。Nye 「以理論解釋歷史」，堅持理論作為分析工具的重要性，並往往以富有哲思的方式，提出「與事實相反 (counterfactuals)」的問題，好更清晰地勾勒出事件的因果輪廓，找出衝突發生的真實（至少是主要的）原因，並導引出



書名：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作者：Joseph S. Nye, Jr.

出版者：Longman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2002 年 4 版

頁數：288 頁

ISBN：0-321-08987-1

推論的新命題，豐富該研究的內容。同時，Nye 從三個分析層次—國際體系、國家（國內因素）、個人—剖析每個待處理的歷史事件，令其分析更為全面且細緻。這樣的功夫看似簡單，研究者往往會因為過份注重分析的邏輯性而忽略了某些事實，或在研究方法上的過度考究，在研究架構上出現分析層次的混淆卻不自知，進而提出錯誤或不夠嚴謹的假說和結論；Nye 則對如何正確分析國際關係，立下了極佳的示範。

Nye 先用這樣的架構，分別處理三個國際衝突的主題：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兩次世界大戰在這個架構下被剖析得非常清晰，雖然無法深入探討每個層次各項命題的內涵，卻能儘量減少因為層次區分上的方法瑕疵造成的研究侷限，而進行更為客觀且有意義的討論。以下，筆者舉 Nye 對一次世界大戰的解釋為例，說明其方法論如何提供分析上的有力支撐。

Nye 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從兩個方面展開推論：先從三個層次著手檢驗，再提出與事實相反的問題，求更深入探討戰爭爆發的原因。在結構層次上，Nye 提出兩項要素：德國國力增長以及同盟體系的僵化；德國大幅提昇工業的生產力，並將之轉變成軍事力量，此一變化造成英國的疑懼，而背棄了平衡者角色，加入歐洲的同盟體系。當問道：為什麼國際體系會從多極體系轉變成兩極體系？Nye 不囿於現實主義的解釋，援引建構主義的觀點，說明為何國際結構會趨向僵化：首先，民族主義興起，造成了條頓人與斯拉夫人間的敵意；再者，普法戰後近四十年的歐洲和平

讓人民充滿自滿情緒，而缺少妥協性；其次，則是由於德國充滿野心的政策讓周遭國家感到不安。在國家（內）層次上，Nye 很果決地否定了 Lenin 關於「帝國主義間發動世界大戰」的理論，卻舉出另兩項具有意義的因素：一個是受到高漲的民族主義衝擊而瀕臨崩解危機的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另一個則是德國國內政治菁英為轉移焦點採行的擴張主義。個人層次上則道出領導人個性的特質對戰爭的影響；Nye 在討論一次大戰的個人因素時著墨較少，於後文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則分外注意 Hitler 的個人影響力。在分層次釐清戰爭原因之後，Nye 要問的是：戰爭真是不可避免的嗎？他給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發生在塞拉耶佛的暗殺事件僅是導火線，若未發生導火線，或這個近因發生前有其他的因素發生，都可能會影響局勢的發展。接下來，Nye 再問道：戰爭的型態可能是什麼？他舉出四種可能發生的戰爭型態：局部戰爭、單（東）線戰爭、排除英國的雙線戰爭、排除美國的戰爭。這一系列的提問，可以讓人得到兩點結論：第一，戰爭可以避免；第二，戰爭不一定是世界大戰。相同的分析方式，運用在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上面，同樣獲致可觀的成就。

至於冷戰開啟後的國際衝突，Nye 則以更開放的方式導引出國際政治中各種不同的衝突因素提出來討論。總體而言，他在本書後半部所揭示的核心概念，便是：國際政治變化萬千，國家面對的是一樁樁前所未有的考驗。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

性質，打破了 Clausewitz 的有限戰爭觀念，但國際政治無政府結構依然存在；民族自決、國際干涉、國際組織、國際法等機制的出現和操作，無不會動搖國家主權的至高性；經濟互賴關係的擴展、資訊化時代的來臨，使得全球化現象漸趨增強；跨國活動的非國家行為者與國家間的複雜互動，或合作、或競爭、或對抗。睽諸此間種種變化，國家的權力在在受到挑戰；國家面對的是更多元的權力結構，而國際政治也不僅僅停留在軍事和政治的邏輯。即使探討的主題已經脫離了戰爭，仍不影響 Nye 在理論解釋上的一貫性，現實主義仍然是他論述的大前提，依然肯定國家在國際關係作為結構中主要行為者的地位，只是國際政治的型態和互動過程正逐漸在改變。

本書對於國際關係的各個領域不能面面俱到地全然包括，很多議題的討論也是點到為止，但這本不是 Nye 的用意。作為一本教科書，此書給讀者的是一个清晰的國際關係知識架構：這個架構的大前提是三個理論，其中以現實主義為主，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作為補充；再來，嚴謹的分析方法，呈現出歷史更真實的輪廓；戰爭、衝突，及其他安全議題這些被解釋項在理論前提與分析方法下，被放置在一個國際政治宏觀架構下被一一檢視，不致被誇大或膨脹某變項或因素而出現分析上的偏頗。Nye 在全書中對理論和方法論上的堅持，也似乎暗示著：即使國際出現新的安全議題，也不能否定理論和方法論的解釋力和有效性。◆

Mancur Ol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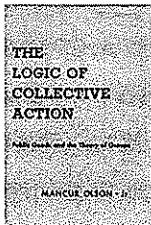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

趙文志 /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生

人類是一種群體性的動物，然而這種群體性所引伸出來的活動為何能夠協調一致的行動？這是一個對於人類為何會產生集體行動的一個根本性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假設前提是基於一個具有共同利益與共同目標的群體，在個人理性的考量下，為獲得利益，會以個人實際行動追求團體目標的實現。在這種思維下，集體行動的出現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必然現象。

而在這樣一個必然性的思維之下，Mancur Olson 一九六五年所出版的「集體行動邏輯」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前面的看法，他認為在人類自利的理性考量下，對於一個具有共同利益或目標的集體性行動的產生去達到這些群體性的目標與利益，是不可能產生的。

作者採取功利主義的理論預設，將社會行動的產生視為源自於個人利益的追求。但他並不同意這種解釋可以用在集體行動之上，亦即，共同的行動是來自於追求共同的利益。相反的，理性、自利的個人不會為了共同的團體利益而採取行動。他強調，群體利益常常是一項公共財 (public goods)，而這公共財具有不可分割性，只要身為群體的一份子，無論他具有貢獻與否，都無法阻止沒有付出代價者的享用。因此，就一個理性、自利的個人來說，在一個集體行動當中最大利益的計算，就是在集體行動中完全不付出任何的貢獻，而享受這個集體行動所帶來的結果。如此，當一個搭便車者 (free rider)，坐享其成，成為每個自利理性的個人最佳計



書名：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

作者：Mancur Olson

出版者：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Cambridge, Mass.

出版日期：1965 年初版

頁數：186 頁

算的結果，而這樣的計算下就會導致集體行動的無法產生。Olson 在此的論證是將利益的計算邏輯推演到極致，每個人針對自身所面臨成本效益的分析，在參與所要付出的代價遠大於所獲得的成果下，不參與成為一種正常而符合理性期待的結果。

其次，Olson 在書中認為團體規模 (group size) 是影響著集體行動的產生與否的重要變數。在小團體當中，成員容易協調與聯繫，在個人理性計算下，由於付出和獲得之間產生淨利相對較大，再加上個人覺得本身在整個行動具有較大的發言權，不會有在大團體中的無力感，所以個人較願意為團體目標與利益付出行動。而在大團體當中，由於參與者數量的龐大，難以協調出一致的行動，個人從集體行動中所獲得的淨利相對較少，因而導致個人不參與集體行動；同時團體規模越大，組織成本也越大，如此一來，搭便車現象進一步使得其他成員不想貢獻自己的力量，共同利益更難尋求支持者，集體行動也越難產生。

因此以理性自利原則出發的 Olson 挑戰了過去對於集體行動的常識觀點，提出個人理性的計算往往導致集體不理性結果的論述。面對這種集體行動的困境，Olson 也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他認為透過強制與選擇性誘因 (selective incentive) 的方式，可以化解這項難題。藉由一個中央性的權威來提供選擇性的誘因，使得集體行動得以成為可能。他在分析美國工會實際運作時，便發現具有強大議價能力的工會，通常是強制性的要求會員加入，貢獻其會費，但同時工會也提供一些會員獨享的權利。所以 Olson

認為藉由強制力與選擇性誘因兩種方式的運用可以解決集體行動上的困境，也就是除了團體規模可以影響集體性動的成功與否外，當團體可以提供成員一些其他的潛在性誘因時，則團體規模變數影響力將會降低，使得規模龐大的組織集體行動得以成功。

然而作者以一個經濟學者所受的理性思維訓練，來看待人類組織團體時，往往以經濟學上對人性的基本假設—利益取向，來處理所面對的課題。作者這樣的推論過程卻很可能忽略了人類思考的複雜性。在人類的個人經驗中，個人優先順序的選擇，常常是感性大於理性，在集體行動過程中，人類行為的主要動機經常不是理性計算的結果，而是對於團體情感的投射，由於對於團體具有某種情感上的偏好或是特殊的信仰，因此個人願意做出較大的犧牲（就理性觀點而言，這是不理性的選擇），來為團體付出，以求達到團體目標。作者使用經濟學上對人類思維純理性的立論假設，來推論人類行為，認為人是一個理性人，在面對抉擇時會以最理性的思維邏輯，做優先順序的評估與排列，然後選擇最佳方案，來達到對自己最佳的結果，然而作者卻忘了先探討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理性計算在人類行動中到底佔了多大的比重？顯然作者並沒有先回答這個問題，就假定人類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理性人（就如同在經濟學中的假設一般）。然而，人類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完全理性（我們從很多對於經濟學研究的質疑中就可得知，以經濟學中供需平衡概念為例，人類假如是百分之百理性，市場供需法則就應該是永久平衡，不會產

生失靈的現象，而過去的事實經驗告訴我們，人類不是完全理性，在人類思考成分中，非理性與情感因素在人類行動中仍然佔了相當的比重，所以市場失靈還是會發生)，團體性的情感因素、個人對某些理念的執著、團體中領導者個人領袖魅力以及不同團體具備的特質與特性都不相同等因素，都使得作者的結論無法充分說明或解釋為何我們使用作者的推論模式去評估時，應該不會發生的集體行動卻發生了。假如作者的結論是正確的，那麼過去的革命行動就不會產生，美國就不會從英國獨立出來，東歐民主化也應該不會發生。恐怖組織、革命性團體、由甘地所發起不合作運動的印度及當時發起二次大戰的德國，其既沒有強制力，也沒有選擇性誘因，有的是對於所處環境的不滿、對於團體領袖的崇拜與尊敬與對於民主的嚮往和國家民族情感的投射，這些團體成員都願意付出自已最大的努力甚至是寶貴的生命，為這個團體的目標努力，而其所可能獲得的回報卻是最少的，甚至只是虛幻的口惠，而非實質的利益。這種價值取向的非理性因素作者並未在文中詳加探討。面對外界這種可能的質疑作者僅以這些團體是一群與社會疏離以致於產生心理上的不安與不均衡的人等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解釋來簡單帶過，同時認為這些活動泰半都只會發生在革命與動亂以及局勢不穩的國家，對於成熟、穩定的國家則不會發生這種狀況。而這樣的說明顯然是不符合現狀的。在西歐先進國家的宗教團體、環保團體等、甚至美國社會本身都有許多團體其個人是不計個人利益得失，而為團體付

出，而這些人絕不應該以作者所說因為其理性程度較低，是屬於少數不適用的個案，而忽略這些事實的存在。此外，一項研究之所以越具有價值，是因為其可以說明解釋的個案與範圍越廣，在本書中，作者僅是以美國的個案來做為作者的推論的依據，但美國畢竟不代表全世界，美國的團體現象顯然只佔整個人類社會團體現象的一小部分，作者以少數個案來推論到全體的作法，顯然是有其侷限性的，這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所應該注意。

然而如此，本書卻不會因此減少了它的價值，雖說完全理性未必符合吾人的生活經驗，但無可否認的是，理性的自利考慮卻是常常浮現在每個人的腦海裡。當吾人在面臨許多重大選擇時，理性思考的確是我們面對抉擇的重要參考依據。而 M. Olson 的這本著作提出其實是滿足了人類過去長久以來對於人類本身思維邏輯希望能做到完全理性的期待的一種投射，反映出希望人類成為一個完全理性人的冀求。而作者也提供了另一種讓我們瞭解社會現象的途徑，讓吾人用另一種不同觀點更加了解人類複雜的世界。◆

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w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游雅雯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伴隨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日益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情勢造成以「國家」為治理主體的世界體系受到威脅與考驗。於是國際治理情勢逐漸走向互賴（interdependence）與多重中心（multi-centric）體系，此時的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s）在國際社會之角色、地位與功能開始受到重視並發揮某種「治理」作用，而這種治理型態則被認為是所謂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是部討論「全球治理」的論文集，全書收錄了 16 篇論文，區分為三大主題，試圖從各個面向去界定當代全球治理的現狀及發展形式，分析當前全球治理結構的正當性，評估全球治理主要規範理論。首先總體的治理本質談起，並論及特定的治理領域，最後以全球治理的理論收尾。透過本書簡要但涵蓋許多重要層面的討論，相信能讓我們釐清並認識複雜的全球現象。

第一部分檢驗全球化對全球治理發展的影響。Ngaire Woods 在本書的引言文章中嘗試說明新型態的「全球治理」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發展與挑戰；探討經濟全球化對於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與組織性挑戰，並特別強調非國家行為者的參與。接下來，Mathias Koenig-Archibugi 進一步分析全球治理的網絡配置，對當代全球治理的複雜結構提出新的系統性概念架構—制度性結構與機制的類型。James Rosenau 以全球治理的複雜性為主軸，認為國際事務透過世界政治的兩個世界（two worlds of world



書名：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編者：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出版者：Polity Press

出版地：Cambridge

出版日期：2002 年 10 月

頁數：384 頁

ISBN：074562734X

politics)¹，全球治理乃成為可能。Jill Steans 則提出女性主義觀點的全球治理，清楚指出「性別政治發生於全球治理之中，這是女性團體企圖影響議題以及抗拒統制規則與規範情況的重要方式」。

第二部分探索全球公共政策議題，評估全球治理的發展與限制。在公共政策議題方面，Nana Poku 藉著回顧愛滋病相關計畫的全球政治與制度性結構討論愛滋病的全球治理。Perri⁶談到的是虛擬世界的問題，指出在跨國國際網路管制中易見的限制，主張通過跨國的公共與私人機構所形成的網絡抑止跨國組織性犯罪發生。Susan Sell 強調智慧財產權協定帶領我們進入一個新的紀元；該協定所表達的是絕大多數屬於科技與合法政策的管理，能有效地形塑各國的國內政治，使全球治理仍逐步地政治化。在國際金融的部分，Jan Aart Scholte 指出公共與私人權力的平衡對於決定一個全球治理配置的有效性起著重要的影響；Michael Pugh 則解釋了如果溫和的全球金融是確保全球經濟穩定的關鍵因素，國際安全的維持為何以及如何從國際政治的邊陲地帶，變成全球治理的優先議題。Phil Williams 與 Gregory Baudin-O'Hayon 的文章則談到全球治理的限制，他們認為體系的治理能力受到管轄權與政治爭議的束縛，此反映了「政府無法控制扭曲力量」的廣泛憂慮。

¹ 世界政治的兩個世界 (two worlds of world politics)：其一是由國家與政府所形成國家之間的體系，此一體系長期宰制著議題的進展，其二則是由其他多元的集合體所形成的多核心體系 (multicentric system)。此兩個世界讓高度複雜全球結構得以治理。

第三部分，重點式的概述統制傳統或全球治理的理論，從現實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功能主義到世界主義，進而提出一系列的反省批判。在這個部分，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理論切入探討全球治理的內涵。Robert Gilpin 從現實主義出發，強調民族國家的能力，對全球治理提出強有力的批判。Alex Callinicos 藉由拼湊全球治理的用詞，展現美國霸權（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的結構性力量的運作，從馬克斯主義解讀全球治理，這不過是另一種政治統治的形式。Anthony McGrew 以自由制度理論說明當代全球治理模式的持續關係；儘管有許多對自由制度主義的批判，卻不致造成其理論危機，只是當今缺乏一個解釋全球治理的自由制度主義理論。Mark Imber 認為功能主義結合戰間期的自由主義，並援引費邊 (Fabian) 社會主義者與新政 (New Deal) 的概念，作為提供戰後多邊秩序的解釋。David Held 從世界主義觀點探討全球治理的未來，認為作為全球治理的研究取向，世界主義的原則不是烏托邦，其主張為「全球政治中更廣泛地權責相符—民主與社會正義」。Robert Keohane 在本書的結尾，申論全球治理脈絡下的規範性問題，指出如何在尊重民主價值之下，設計一個適合部份全球化的世界制度。

最後，引述 Keohane 的話與關心全球治理發展的人共勉：「如果全球治理制度設計良善，將會促進人類福祉；若我們搞砸了，其結果則將具毀滅性。有效率及人道的全球治理配置並非必然發生，必須依賴人類的努力與對政治的深入思考」。◆

Ira Katznelson &
Martin Shefter, ed.

Shaped by War and Trad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efan Heumann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country shaped by war? While for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nswer might seem obvious, scholars of American Politics have largely neglecte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American state building. They have largely focused on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dhering to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at they were shaped by a liberal political tradition which goes back to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scholars have further perpetuated the mainstream view of the American state as weak referring to it as being constrained by a liberal constitu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A group of American scholars who operate under the label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PD) have called the weak state thesis of the liberal tradition scholarship in question pointing out the administra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American state. The American state has in numerous ways been involved in huge organizational tasks such as the expansion of the Western frontie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ts economy and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al market. APD students have been willing to cros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between history,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order to illumin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state building. *Shaped by War and Trade* assembles some of APD's most



書名：Shaped by War and Trad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編者：David Held and

Martin Shefter

出版者：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Princeton, N.J.

出版日期：2002年4月

頁數：352頁

ISBN：0-691-05703-4

prominent scholars such as Ira Katznelson and Theda Skocpol and some renowned schola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ch as Robert Keohane and Peter Gourevitch giving proof of the editors' willingness to cross boundaries between subfields of political science as well.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volume Ira Katznelson situates the enterprise of the book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PD scholarship. Many schola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abandoned the model of the state as unitary rational actor whose preferences can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it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system. Inspired by Peter Gourevitch's influential article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and Robert Putnam analytical model of two level games those scholars hav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domestic politics in order to explain foreign policy. The large debate on the "Democratic Freedom" is further proof of the trend that the analysis of intern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conflicts contributes to the explanation of how states define and pursue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hile students of American politics have sporadically incorporate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and events in their studies, this book is ground-breaking because it calls for a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in research on American state building. Even though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USA in the

aftermath of September 11 2001 are not dealt with in the book, the adoption of the Patriotic Act, the creation of a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the heightened priority of military spending in the federal budget strikingly show how releva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can be for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ue to those recent developments which have culminated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to lead a pre-emptive war against Iraq which will probably be the decisive issue in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 will focus my discussion of the book on the influence of war 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makes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issues such as trade policies on domestic policies at least as relevant and worth studying as the influence of war. In respect to the current salience of the Iraq war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global attention and debates which it has generated and following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book which features six articles solely concerned with war compared to three articles merely focusing on trade I think that this decision is justifiable.

Robert Keohane's article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 one of the weaker articles of the volume. He sees the Civil War as the crucial period when the American state gained the capacity

to enforce it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within its own borders. He supports his thesis showing that before the Civil War there were several instances when due to the weaknesses of feder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American state could not fulfil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This is certainly true for the young American state shortly after it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Several states refused to return property or pay debts to British Loyalists even though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Great Britain in 1783 obligated them to do so. But the failure to keep the treaties with Indian tribes guaranteeing them a right to certain lands in exchange for land for American expansion can be rather attributed to an unwillingness of state officials to enforce these treaties than to the constraints of American federalism. Instead of analyzing how the Civil War has strengthened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Keohane cites the protec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 workers by federal courts against discriminatory laws by several states and therefore successfully enforcing international treaties with China as sole example of a strengthened federal state in the post Civil War period.

Keohane's thesis is directly contradicted by Katznelson's chapter "Flexible Capacity: The Military and Early American Statebuilding" in which he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early American state building. Katznelson argues that weakness should

not be conflated with size. He also challenges the thesis that liberal states are necessarily weak.

A liberal state possesses advantages in solving problems of coordination and building extensive capacities because it is more likely to be accepted as legitimate and better able to harness the pluralism of civil society by hitching "stateness" to competing political coalitions.¹

Besides the argument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state institutions which provided the necessary stability,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law Katznelson points out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period between independence and the Civil War. Without a highly flexible and effective military the conquering wars against Indians and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the American state could not have been achieved. The military was also used to put down numerous rebellions which were caused by economic depressions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War of 1812 and the Mexican War presented further challenges to the American army. Analyzing the military tasks of the early American state Katznelson emphasizes that distinctive liberal institutions frame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peculiar way

¹ Ira Katznelson, "Flexible Capacity: The Military and Early American Statebuilding," p.86.

in which the American liberal state used his army to expand its boundaries and to secure its territory leads to a promising fusion of the analysis of military state build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liber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rise of the USA to a global superpow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rendere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even more urgen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whose high defense budgets sustaine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In the chapter titled "American Antistatism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old War State" Aaron Friedberg analyzes how the Cold War State based on immense military armament was formed in a political culture of antistatism. The strong antistatism of the anti-New Deal coalition of Republicans and conservative Southern Democrats strengthened by popular distaste for state interventions shape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security state". Frustrated by the economic regulations of the New Deal American businesses spent large sums to fuel antistatist sentiment and campaigned for financial inducements rather than regulatory policies to expand military armament. The government contracted private enterprises to research and produce military goods. The "contract state" disguised the large expansion of the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because free enterprise rather than state owne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dominated the defense sector. Key state functions conc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were handed over to private institutions. Friedberg sees a strategic advantage in the private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 "security state" because it kept the American state from growing too large and made the defense sector more flexible. Howev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s shown that private defense industries are at least as resistant to cutbacks as a nationalized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ivate business interests and quest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has become blurry. It can be regarded as very problematic that the strategies for the second Iraq War were made by men who combine careers in the defense industries with high ranks in the defense department.

Bartholomew Sparrow analyzes how the constraints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haped the military strategy of limited wars and how the need to maintain political consensus in times of war shaped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chapter called "Limited Wars and the Attenuation of the State: Soldiers, Money,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World War II, Korea and Vietnam" Sparrow spots a decline in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as the unpopularity of the military action in Korea and Vietnam steadily grew.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nsent of the population the strategy of limited war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the American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case of the Korean and the Vietnam War warfare was limited to the territory of each country. Government officials played down the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each conflict in order to maintain public support. The Cold War and the military engagement in Korea and Vietnam strengthened the American state in respect to the size and strength of its military. But overall Sparrow talks about an attenuation of the American state because especially during the Vietnam War era government became detached from the American public losing its legitimacy and trust of its citizens. Increasing numbers of young Americans tried to avoid military service and fewer citizens were willing to invest in US saving bonds 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income taxes for its funding. That the American state has learned its lessons from the Vietnam War has become visible in the two Iraq Wars and other military intervent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strategy of Limited Wars has been expanded to include the aim of low American casualties and to put as little a burden on the American public as possible. Policymakers and military planners have also returned to news censorship and in order to control media coverage and assure public support.

Peter Gourevitch's and Martin Shefter's chapters conclude the book pointing out schemes of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State

building in the wak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and engagements. The greatest value of the book does not necessarily lie in its different studies of American state development, many topics of the book need much deeper exploration, but in opening a whole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bridg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rs put enormous stress on domestic institutions, particularly on the military. Providing security is the core function of the state. Linking the military and state-building therefore makes sense. Because of its geographic position American history might not have been as bellicose as the history of many European states. But recapitulating just the few authors of this book shows that wars and conflicts continuously occurred in American history. Some period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have been more bellicose than others and the type of wars and conflicts greatly differ. State-buil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has been more shaped by classical wars with external enemies. The 19th century saw a major internal war, the Civil War, and many more small scale wars against Indians and internal unrest. There are important analy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wars. However one thing seems to be very obvious: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much a country made by war. ♦

【徵 稿】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全國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徵稿對象：全國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稿件內容：

- (一) 書評：針對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書目：針對新近出版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截稿日期：每年二、四、八、十一月十日以前。

■發刊日期：每年三、六、九、十二月五日。

■稿件筆潤：

- (一) 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元整。
- (二)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本刊物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唯保留此項權利。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電子郵件：PoliSciReview@ntu.edu.tw
- (二) 一般郵寄：台北市中正區(100)徐州路 21 號
臺大政治系[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

【徵人啟事】

本刊徵求校外編輯委員

全國各政治相關系所碩士生有志參與學術刊物編輯者優先選任

(簡歷請寄 PoliSciReview@ntu.edu.tw)

中華郵政台北誌字第346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